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二）▶▶▶▶▶▶▶▶

张秦◎著

# 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发展能力向可持续发展力的跃迁

Study on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经济文库·应用经济学精品系列（二）

张秦◎著

# 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发展能力向可持续发展力的跃迁

Study on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发展能力向可持续发展力的跃迁 / 张秦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36-3247-8

I. ①区… II. ①张…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IV. ①F114.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0368 号

责任编辑 赵静宜  
责任审读 贺静  
责任印制 马小宾  
封面设计 华子图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70千字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6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136-3247-8

定价 68.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179 号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http://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5416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88386794

## “序 言”

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也伴随着人类自身能力的成长。今天这个浓缩、汇萃、释放着人类文明创新成就的豪迈时代，却也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向往和追求进步的同时，却为自身选择的过程和结果所困扰。这个事实成为了人们在驾驭自身力量改造世界时造出的一面镜子——“危机之镜”，镜子里照出了人类自身的困惑。在人类全部能力的成长中，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赋予“追求”以适当的度，赋予“能力”以理性的方向，人类才能真正地无往而不胜。这个方向就是：能力必须插上理性和智慧的双翼，社会与人类的发展才能自由地飞翔。也就是说，为了克服发展和能力的反向性，我们赋予了它们可持续的方向，能力自身的可持续才能推进发展的可持续。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模式、一种理想、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文化，而其实现取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观、财富观、生态观的群体性觉醒，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的理性变革，取决于人类智慧与欲望博弈的成效。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智慧选择下的一种理性生活观念和方式的变革，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深度和谐、高度公正的综合体，它本身也是动态的、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

20世纪中叶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个哲学命题变为现实问题，成了备受关注的社会发展主题。人类活动与生存方式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变化。社会发展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到了对立、对抗的紧张状态，威胁着人类生存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组织的演化方式显然已经受到了人类自身活动的威胁，这种威胁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人类的弱点和存在方式的缺陷，也照出了人类的困境。这面镜子引发了人类对自我的反思。人们开始思考发展方式，权衡发展代价，寻

找新的科技、经济手段的支点，修正自身的发展机制和路径，以期走出人类“历史终结”的困境。然而，在现实面前，思考之后形成的认识和观念，最多仍只是发展之路的一个开端，以人类为中心的行动依然没有止步。危机的解除之路，往往比威胁的形成过程要复杂和漫长的多。但除了突围，我们别无选择，而基于能力基础之上的可持续发展为突围提供了可能的现实“道路”。

---

尽管来自于自然的“警钟”从未停歇，但是作为征服者的人类，“进军”自然的战鼓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人类在危机之路上依然在阔步前进！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其当时还未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手稿中从人的存在发展出发，探讨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指出了劳动与自然一起才构成财富的源泉，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从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们在社会关系的相互制约出发，预言了现代公有制的建立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前提。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后果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恩格斯警告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sup>①</sup>之后，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意大利等地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等行为造成的环境悲剧，并告诫人们，“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sup>②</sup>。

---

①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05.

②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05.

然而，因为当时的环境问题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危机”之镜，恩格斯的“警告”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理解和重视，“掩耳”擂鼓的征服者，终于在一个世纪之后又听到再度敲响的“警钟”——在1962年“迎来”了《寂静的春天》。蕾切尔·卡逊，这位被人们称为绿色生态运动的拓荒者和先驱者的美国女作家，在历时4年的调查研究之后，披露了农药造成了全方位污染，描写了本该充满生机的原野成了“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里的一片死寂”。她告诫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对自然宣战必定伤害自己”，“人类正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她强调环境实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批判了欧洲科学界传统思维的狂妄，认为“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简直出语傲慢，不过是生物学和哲学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妄自尊大的想象的产物，认为那时的“人以为大自然是为了人类才存在的”，呼吁今天的人们“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我们的地球”。然而，在这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的呼吁声中，今天的科学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物种灭绝的速度，已大大超过了物种在自然进化过程中死亡的速度。300年前地球上就有25亿个物种，现在却只剩1亿个物种了，而这个数字的变化有60%是发生20世纪工业文明兴起的阶段，更让人痛心的是，动物正在以每天一个物种、植物以每小时一个物种的速度在消失。而依照统计显示，今天的地球表面，每分钟会有40公顷耕地荒化，每分钟有11公顷土地沙化，每分钟约排出8500吨污水，每分钟有28人死于环境污染……然而，据美国人类学家计算，地球村人口达到第一个10亿经历了200万年，第二个10亿的增加仅用了100年，而第四个10亿竟然只用了15年，到2050年，地球村的人口将接近90亿……共同拥有的地球成为把每个人的命运和人类整体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纽带，“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冲刷掉岸边的一块岩石，欧洲就少了一点；同样，如果一个海岸，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会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同人类是统一的。所以任何时候也不要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sup>①</sup>当我们怀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与乐观来看待发展时，这回敲响警钟也助燃了燎原星火之势，催生

①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一书的题词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理性的回归火种。

可是，人类却踏着钟声走向了误区，使随即出现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的实践陷入了步履蹒跚的境地。人类需要的逻辑起点与发展方式的走向形成了其主要的原因为，即现成的经济规律下的现行利益格局与后觉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体系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现行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思维与可持续发展的冲突<sup>①</sup>，导致了人类发展步入误区：

首先，是GDP至上的误导。单纯以GDP为尺度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准，是一种全然不顾增长背后必然的耗尽资源、破坏环境负效应的盲目行为，全球范围内也因此导致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发展，几乎都是以依赖过度开采和耗尽资源为基础的现况，而既成的事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GDP增长对于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成就感，实际上已经被生态环境的损失所抵消或冲淡，我们因此也期待绿色GDP指引我们走出误区。

其次，是“消费者主权”的误导。其实质是消费者决定市场的理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商品与服务，这种通过市场向生产者发出的信号，变成了生产者的生产指令。然而，消费者的指令并不总是科学而正确的，比如，一些消费者穷奢极欲或放纵的恶习常常引发整个社会生产的扭曲和变形，捕猎濒危动物的行为破坏了生命支持系统的多样性，对于贵金属和能源的需求则直接深度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人类的真实欲望被促销广告和享乐的观念美化，往往又让事情变得更糟。

再次，是人类生存标准压力下的误导。可持续发展要求确定人类自身的需求标准或消耗标准，但现实中的就业压力、扩大社会收入、缓解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许多时候甚至是国家、政府或企业集团的多重利益格局的驱动，点燃了整个社会扩大需求的愿望，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不断放大着需求的标准和规模，忘记了取之有道的方式选择，有的甚至是“利”字当头、明知故犯。

最后，是市场的价格因素的误导。现行经济规律和经济思维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成本是生产者使用生产要素的基本要素，而物以稀为贵的定律

---

<sup>①</sup> 刘学敏. 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告诉生产者，价格低时买入、成本低。对于资源而言，资源丰富自然价格就低，资源稀缺价格必然走高。这样的规律下，追求资源丰富时的低价格——消耗资源直至资源殆尽（价格提升甚至提升至消费不起的地步）——寻找替代资源的线路就成了现有经济发展格局下人类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必然趋势，而这样的格局趋势的直接结果就是“先破坏、后修复，先污染、再治理，先浪费、后节约”的模式成为一种必然。显然，人类社会当下的发展还离不开市场规律，一边是“寂静的春天”对发展的警示与忧虑，一边是繁华的闹市对发展的张扬与推崇，但我们还是寄希望于这个“闹”字——给“市”（场）一个合理的边界，因为可持续发展观需要理性的法制的市场机制与之相匹配。

## 二

泰戈尔说，“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我们假设，如果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就以一种爱惜之情和爱惜的行为，保持合理的“距离美”，那么，人类就变成了“神类”。然而，人类毕竟是人类，人类是有需求、有利己之心的，在利益与理性的冲突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就是要求人类以人自居的同时要修炼自己“神化”的理性观念与行为；社会是有需求的、有秩序之规的，在需要与供给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社会实现人的利益需求的同时修炼自己“神化”的理性的秩序和能力。人类的理性为人的“神化”提供了可持续性，这便是我们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最终能否变成实现，根本上取决于建立在人类智慧基础之上的理性之光能够照多远、亮多久。毕竟，可持续发展不是“神”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危机之镜”是人类需要与发展方式“异化”而导致的人的初衷背道而驰的“意外”结果。人的理性的被动与自觉，终将成为战胜威胁与危机的骄傲。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为社会的进步定义了“发展”的概念，但是工业文明以来这个寄托着美好愿望而富有积极含义的词汇，便再也不能跳出正负两方面效应的困扰，也正是由于人类对发展真谛的反思才真正意识到了发展的“度”的问题，才有了



发展一词前面的限定语——可持续、持续性、科学等。

人的可悲命运正是因为人的不幸产生于人在本源处没有能力解决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致人征服自然的工具变成了增加人类社会问题的工具。<sup>①</sup> 人类通过发展成就自己，也必须有勇气纠正自己，在发展中约束自己。环境与生态的危机与警示，让人们在这种成就与约束之间调适着与自然之间合适的距离。但是，现实中发展能力的滞后性与发展所自有惯性的叠加，使人类在把握发展方向与方式时必须保持审慎态度，这种审慎是在克服利己本性基础之上的理性，可持续的发展对这种理性提出了必然的要求。然而，在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之路上，将实现发展的理性变成自觉的难度绝对不亚于把握发展规律本身的难度。

让人欣慰的是，人类的理性与智慧，从“九二共识”开始，启动了回归的号角。1992年的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以达成“共识”的方式让人类看到了理性的曙光：“所有的人似乎在分享着一种更深的理解——我们都属于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广大的世界，这个世界家族的血缘联系不是那么的紧密。然而，对每一个他人的未来的责任，对整个地球环境的责任，却把我们变成了一家人。”<sup>②</sup> 联合国这次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历史上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全球21世纪议程》，把1980年首次提出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列为全世界的发展战略，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和理论走向行动的重要开始。通过自身的理性回归与智慧重建，人类将获得在社会发展系统中存在的自信，同时，也将获得全部生存的尊严。那么，对于人化自然的系统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必将以社会和谐来体现人在自然面前的高贵，来代表人类最终的追求和目标。对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来说，其系统内在机制中的自我修复的“活”的因素，能否通过特有的“自组织”效应和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同时，能否“笑纳”人类的理性回归、以被“人化”的发展与人类和谐相处而不再“反抗”与“报复”呢？换句话说，可持续发展系统的自组织行为与人类活动，以怎样的互动

① R. 尼布尔.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8: 2.

② 阿尔·戈尔. 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5.

才能达成和谐发展或“和解”的“协议”呢？“富裕的世界之所以富裕的主要原因以及为什么它的经济增长有一半以上来源于生产率的增加，并非它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是它拥有丰富的知道如何使用的思想。”<sup>①</sup>因此，我们必须思考和探究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上帝等待的“童年”，必然不仅是孩童的幼稚与顽劣，上帝等待的是人类孩童般的真挚与无邪，等待的是人类理性的回归和智慧之美的自建与延伸。

### 三

我们站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现实的今天，有“一览众山小”的优势。发展的历史和其未来的进程启示我们，可持续发展作为系统，其自组织机制下自身的调节和自治能力是有限的。尽管人口子系统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个自组织的主体性组成部分，但如果将二者合一来考量，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将是人类系统自身的革命，将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归根结底将是人自身能力的“可持续”建设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的问题。那么，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便归于我们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力建设的问题。如果将人类与自然作为对立统一的双方来考察，无论是从自然视角出发的生态伦理学、地表资源决定论、绿色生态运动等，还是从人类视角入手的发展管理者角度、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等，还是将二者作为矛和盾的冲突论，都是偏重于现象的分析与综合，深刻于他们对原因的解读和挖掘。这些理论在看穿了人口压力、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人性贪欲与利己等问题之后，不但探究了环境意识的缺失、生态行为的背离，以及危机背后的经济制度缺陷、技术双刃的误伤，还深入探讨了文明机能的失调、精神文化的失责等深度根源问题，研究之深、分析之透令人仰止。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探究最终只停留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阶段，虽然有的研究试图提出解决“怎么办”的方案，但也多因缺乏系统思考和系统性构

<sup>①</sup> 吉姆·罗沃. 对思想的想法 [M]. D. 尼夫. 知识对经济的影响力.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建，而停留在单一或部分要素“呈点状分布”的计划方向上，致使操作的现实性偏小。而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引入了系统论之后，为“可持续发展”增加了新的内涵与维度。这些内涵和维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将环境作为中心，侧重强调生态系统的环境保护论；以经济作为中心，追求经济发展的净利益最大化、产品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的经济核心论；以人口要素为中心，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以代际关系诠释的全面发展的人本论；以及把“自然—经济—社会”复合作为轴心，将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的三位一体论等。这些新的理论维度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系统性地研究了可持续发展。但这些不同的理论之间及其内部依然缺少某些重要的环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少对系统内部演化的动力环节的关注，因此最终也缺失了发展理论与实践相连接的、最具操作性的链条。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便是人类的发展，人类作为发展的主体，其系统自身的理性革命和智慧变革才是发展能否可持续的决定力量。因此，人类形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其核心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而可持续发展系统的最重要的那个动力环节，便是人类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问题。

新的思想视域下新的要素重组的实质是创新，能力角度重构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要素体系重构的创新中，也必然蕴含着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理论探索。按照可持续发展原理内在机制的运行规律，站在可持续发展力系统研究的视角，需要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再认识、再定义。着眼于宏观站位，跳出经济、环境、资源、生态等属性的传统视角，聚焦可持续发展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以解决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与客观环境供给的有限性矛盾为动因，在强调了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主观自觉性的同时，强调了能力进行动力（发展力）转化的客观现实性。这一思维体现了三个核心关系，即内容上体现了要素（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五个硬系统和发展力软系统）关系，时间上体现了当下与未来的关系，空间上体现了演进次序的关系，性质上突出了发展的理念和模式的定位。因此，可持续发展可以定义为：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无限性”需求扩张与客观环境的有限性供给之对立统一体中，人类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向可持续发

展力的现实转化为方式和手段，理性调节当下的需求行为和方式，来确保未来的人化自然系统诸要素间平衡有序的关系态，并依照先局部（区域或国家）后整体（全球化）的次序，最终走向“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健康、协调、持续性发展的社会历史的演进理念和模式。本书的研究告诉我们，单纯的能力系统依然不是全部的动力环节，只有能力系统找到了可持续发展力系统的定位之后，人类才能找到启动自身发展和整体社会可持续发展动力系统的钥匙。而当我们试图从可持续发展系统内在规律出发而寻找启动可持续发展动力的钥匙时，却依然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现实困境，这种困境在于“共识”之下的行动的“共振”。

## 四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可以体现为“共识”，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和结果，却必须依赖“行动”。这种行动不是局部的、个别的，而是全球化的理性行动。可持续发展共识与理论的形成，是发展的“危机之镜”反照出来的，是生态和环境威胁倒逼的结果。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人类的思想和精神特质，可以使先进的观念和科学的理论，在普及方面迅速地达成某种“共识”或认识上的同步。尽管分散在各地域的人们，在“试错”代价的获取上有大小和先后的落差，取得间接经验的途径仍然能够使同步共识的愿望有很大的现实余地和可能，但是达到行动同步却绝非易事。一方面，人们“试错”的结果有一定惯性，可持续发展力的建设要发挥效力也有一定滞后性，这方面的因素是发展本身的规律，是客观的。另一方面，从世界的各个局部看，一是由于人的理性会被错误和利己性甚至是习惯蒙蔽，人的自控能力存在天然的缺陷；二是由于不同的利益集团以民族、企业、国家地区等为聚合形式，所存在着的不同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的冲突等，都可导致全球各局部的利益纷呈与交织、博弈与对抗，也必然导致可持续发展力的建设的非生态性方向或非和谐性表现，从而可持续发展动力机制的全球化运行形成了现实的困局。

这种实现全球化的共同的制度机制的指引，为发展的持续性的全球性

同构提供了方式和路径的可能。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具体实施方案的讨论：实现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子单元是国家，而构成国家的基本单元是建立在行政区划基础上大大小小的区域，区域虽有不同层级和功能，但都属区域，而我们研究的课题便是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尽管我们的实证分析有中国化的色彩，但研究方法上的理论抽象与理论共性的逻辑推演，无疑揭示的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动力机制的共性规律和普遍原理。它是从自组织系统的规律出发，从动力机制的软系统的方向，兼顾了系统本身的自发性秩序与人类主体的主导秩序的关系，同时开放、有序的自组织体系既为主体主观因素动力方向上的协同创新提供了系统固有的保证，达成了动力创新与系统内在关系所反映的系统秩序的衔接，也实现了动力机制创新推进的以发展持续性为产物的结果。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是把社会看作一定经济形态的社会有机系统，认为社会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基于能力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力系统的构建，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强调，列宁关于系统的思想也强调了事物间联系和“中介”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 $\alpha$ ）历史地，（ $\beta$ ）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 $\gamma$ ）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sup>①</sup>“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sup>②</sup>发展是可持续的前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主体或中心体，存在于人（主观因素）的能力与存在于物（客观因素）的能力或条件的有机联合，及双方相互作用过程的关系态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可持续发展力，可持续发展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动力系统，是对应了认识事物所要关注“中介”之“要领”的。可持续发展力软系统的连接作用，形成了内在的以关系力为纽带的新型系统结构关系，既是一种系统思维方式、又体现着系统主体的价值取向，同时关注着系统内资源的配置方式，以一种系统内生动力的机制形式存在，而其以人的主体性为依据的五力体系推进要素的子系统本身，也是在抽取不同利益格局、不同技术条件，甚至不同意识形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38。

②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9。

态下区域共性和共有的动力要素而构成的，这样的构建为可持续发展局部先行提供了可能，也为区域差异化条件下实现系统的同向“共振”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方法，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全球化“共识”目标到“共振”行为的实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考方式和运行模式。

## 五

杰出的物理学大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用“如果人类要想生存下来，我们就必然需要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来表达对人类生存的担忧，并指出了“全新的思考方式”的重要意义。而宋代诗人程颢也用《秋日偶成》中“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的诗句，说出了道与思的关系及思的对象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循沿着这样的提醒，将全新的思考方式与对于发展本身的考察，做一个“类相对论”的解读：全新的思考大体有两个基本方向，一种是在现有参照系下，在认识一个事物规律时，突破事物本身及其本身所在的环境，研究事物自身结构与功能，用系统思想多因多维地思考，用历史视角看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进，用空间概念来看对象的方位及其周边关系，这种思考方式如同在现有的固有时空体系内进行思考。尽管这种思考有可能实现多因多维的融贯，尽管这种思考带有穿越过去、展望未来和事物普遍联系的开放性，但其参照系有其封闭在同一坐标系下“绝对”的一面。另一种思考方式，选择新的参照系，使新的参照系统下事物面对不同的境遇，比如对于发展的理解和定义，在农耕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因为其参照系的变化，除了事物的性状、特点、条件、环境等发生变化之外，必然带来思考方式的新变化，带来实现手段和路径的新变化，尽管这种参照的变化是有条件的，社会历史的自然选择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暂且将对于发展的第一种思考方式称为“发展绝对论式”的思考，将第二种情况下的思考方式称为“发展相对论式”的思考方式。

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讨论思考方式，而是我们的思考恰巧处在了一个参照系发生变迁的时代。我们在传统历史条件下，站在工业社会的大地

上，以“发展绝对论”的思考方式，从发展动力系统——可持续发展力的角度，来考察了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和其跃迁机理。在这样的“坐标”体系下，基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力的动力模型，对于区域发展主体责任的要求，必然地反映和折射着对国家责任的要求，国家责任的背后是政党使命的体现。国家责任和政党使命的直接指向是要从其自身所在区域做起，从实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和社会和谐型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开始，从可持续发展力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有效对接开始，才能让发展的理性之光照亮未来的道路。当今世界，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和不协调，呼唤人类以正视现实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去解决、去调整自身的生存方式。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出发，从求同存异的人类合作的大方向上考虑，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和谐是各种文化中共有的一种恒久的普世价值。只有形成以人类共有的生态道德前提的理性合作机制，才能成就发展可持续性的可能。坚持共同的国际公约性制度遵循的发展标准化构建，坚持拥有发展权与承担发展义务相统一，也必然是超越了意识形态和利益多元化之上的理念和行动。也因为，当下的人类陷入了共同困境，遭遇了共同“威胁”，面对着共同的“危机之镜”。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度行为的后果，必然是要面临等待自然不期而至的报复，在这场“罪与罚”的等待中，人类必须以自胜为先，在发展之路与自然之罚间，主动设置安全屏障——以自身的道德与法治的力量来自胜与自律，通过生态道德、和谐发展理念，设底线以实现良知的自胜；通过严格的环保法规和奖惩机制、补偿机制的落实，设红线以实现罚“恶”的自律。这样，人类的理性便不是被自然惩罚出来的理性，人类的理性才能成为自觉的有尊严的理性。

可持续发展全球化的实现，必然是先从局部实现而后构成了全局的实现，如同燎原之势必起于星火。那么，解开这个困局通常的思维方式和解决路径有两种，一种是在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指导下的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方向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无论是“从红到绿”“红绿交融”，还是“绿色红化”，都是以依赖于世界性的社会制度的革命而走向“公有制”这一基础，在“红”的基础上实现的“对自然的人道占有”的“绿”的生态和谐路径，因其依赖路径缺乏实践性，所以这个方案的合理

性多现于局部或者更多地表现为提供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路径。环境问题固然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但从现实情况看，“危机之镜”不是单纯地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对于地球上已经出现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这样就将我们的突围的第二种解决方案，推到了现实的、当前的情境之中，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社会制度的更替是需要时间的，而可持续发展是不能够等待的，“今天，我们精心谋划向可持续体制转型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我们可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但行动过于迟缓。我们未能肩负起对后代甚至对当代的责任，”<sup>①</sup> 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当下的格局来考虑和设计。从理论上讲，第二种方案的实现需要一个从共识到行动的约束机制作为前提，即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机制的保障——国际公约（法）。对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跨国企业或公民行为而言，其不仅具有提供世界范围内共同遵循的价值和规范的直接意义，同时还具有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法律政策制度的本土化实施与国际化构建提供借鉴的间接意义。令人欣慰的是，“除了和平、安全及尊重人性之外，可持续性——保护环境并保持现在和将来每个人自我发展的机会——已作为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出现在当代国际公约法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公约法不仅以宣言和计划的方式发挥作用，而且提供了实用的法律工具，并日益适用于更为强调指导行动的计划 and 规则之中。”<sup>②</sup> 尽管关于国际公法在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实践进展令人瞩目，但是由于其法律的刚性、体系完备性、监管措施的操作性和各国因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权、环境保护、善治方面等引发差异化的新的发展方向，使国际公约法面临诸多挑战。但无论如何，这是当代人类理性推进发展的一种共同价值体系的实现方式。

传统犹在，未来也扑面而来。新的“坐标系”已经让时代的车轮和人类的进步，悄然地推到我们面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和互联网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尚需要新的技术革命来给出一个清晰的划分，尽管我们仍然乘坐在工业文明的列车上，但这种转型和变革是不以人的意

① 科菲·安南，联合国前秘书长在孟加拉国达卡发表的演讲。

② [荷兰] Nico Schrijver. 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法中的演进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志转移的，已经势不可挡地置换了人类的生活背景和生存空间，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必然给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自身固有的张力打开了人类超越自身局限、外向于社会的开放度和参与度；变革了传统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及其互动模式；人的思维、组织行为方式和能力支撑，因为知识化信息化的“大数据形态”而发生了突变；技术进步能量的释放，为物化形式的创新和科技成果运用，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现实与虚拟的存在及其融合，不仅改变了人的社会角色与分工合作的传统形态，也催生了社会生产、消费、生活方式的“变异”，推进了以人为本的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从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预言的“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理想，在公有制尚未世界化的时刻，在社会形态的本质区别之下，惊人地出现了某种“形似”或一定意义上的“神似”。而这样的人类存在环境和方式，即所在“参照系”的转型，也直接地现实地意味着发展的环境、条件、方式和方向的转型，新的时代的“风云变态”为“全新的思考方式”提供了新的平台。

“发展相对论”的参照体系，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的当代化特征。对于人口子系统而言，人口规模的因素之上，人类理性的形成、聚合、传播速度及其影响力的广度、深度，人类利益需求的方式和方向，都在互联网的今天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社会子系统而言，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以及生活、生产、消费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的开放度和其组织要素的集聚、流动、运行方式，公共服务的多元化、效率性，制度安排的科学化水平、执行效力以及社会管理、监管控制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经济、环境和资源子系统而言，技术进步以基因研究的突破、3D技术的应用、空间技术的进步、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利用等为代表和方向，重构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关系。互联网提升了人类的发展能力，推进了社会在体验经济特征下的系统内的“关系态”的变化，从而使发展的自身系统性发生了整体性、结构性的演进。这样的演进，同时有着正向推进发展可持续性的乐观，也有着方向偏差后出现更大风险与危机的可能性，尽管这种风险总是会被浩荡的历史进程所淹没，总是符合曲折前进的铁律。对于处在转型时代的人类而言，能够使一切乐观的发展可能走进“必然王